

第二十二章

逃出“满洲国”（华北行之一）

在警察、宪兵中也有少数洁身自好，不与恶人同流合污的人。在危难时刻，我就曾得到他们的帮助，渡过了难关。

当时，“宪兵”这两个字如何了得？不但穿这身“狗皮”的主儿没人敢惹，就连他们的亲朋故友也能借上点光。

离江上军的江北作业队不远，马船口以北五公里处有个“独立宪兵训练团”，就是宪兵的训练基地。其人员不少来自本地富家子弟，还有就是南满铁路沿线的金、复、海、盖几个县的“满洲”青年。这些人由于受奴化统治时间较长，大都粗通日语，有点文化。在日军兵源枯竭，人手奇缺的时候，这些人就充当了“替补队员”。

按“国兵法”选拔出的这些优秀人材就被送到了“训练团”进行集训，其入选条件是：思想纯正（拥护日满亲善）、忠君爱国（忠于伪满皇帝，爱“满洲国”）、身体健康（有个人样，不抽大烟）。一经选中，就披上黄皮佩上黑领章，戴上紫底黄字的“勤务”袖标，可以阔步街头了。沾沾自喜之

余，立刻电告家乡父老。岂不知一进了这个大染缸，不出两三个月就被酒、色、财、气所淹没，渐渐变成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恶棍，日本人的帮凶。再进一步，如果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入了日军军籍，就可以成为“宪补”，那就更不得了啦。

这类人家往往为了炫耀，将他们的大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有的甚至与祖宗牌位并列。一为“光宗耀祖”夸耀于亲友，二是当成护宅门神，让社会上的地痞无赖有所忌惮……因为“宪补”的袖标与日本宪兵稍有区别：前者为黄底红字，后者为白底红字；宪补和宪兵只有一字之差，所以拍照片时特选角度，只让臂上露出一个“宪”字来。而黑白照片又看不出黄、白之分，农村老百姓一见照片已如见狼虎，哪里还分得清什么“洋老爷”和“土老爷”！

不过话说回来，在军、警、宪的大染缸里，也确实有少数洁身自好，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在命运的驱使下投身此道，原因各异，不外乎是找碗饭吃或是不受黑道欺压，借这身“虎皮”来明哲保身。

我认识的一个叫张再逢的警尉，就是这样的人。张再逢年龄在四十上下，供职于道外警察分局任治安股股长。为人正直憨厚。他就住在江上军司令部附近的平民区一个大车店的院里。家中只有老母、少妻共三口人，并无儿女。

这人对母亲非常孝顺。每天规规矩矩上班下班，从不涉足酒楼、妓馆，待人接物和藹公正，街坊邻居提起张警尉来没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有一次，我一位同学的老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商人，因店伙三五个人打麻将消遣被治安股的小警爪抓获，以“聚赌抽头”的罪名关押起来，进行大肆敲诈。同学小姜万般无

奈找到了司令部求我给想想办法。我与张再逢有点交情，此事又义不容辞，马上带这个同学闯进了他家。

谁知正赶上他老娘重病卧床不起，已经请了几个“名医”诊治，但不见起色，正愁得张再逢唉声叹气，团团乱转。

“左老弟，你放心，这事大哥一定照办……”他一边满口答应想法营救小姜的老爹，一边抽泣着说，“我老妈病得这么重，这几天连旱烟袋都不抽啦！”我和小姜又是感动又是不安，觉得真不该在这种时候来麻烦他，于是带着深深的歉意告辞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我就接到张再逢的电话，告诉我姜老头罚款一百元后已经取保释放了。我立刻给小姜挂了电话，果然他在电话中高兴地说：“左大哥，我爹已在一个小时前坐洋车到家啦！”

当晚，小姜和他哥哥拉着我去张警尉家道谢，掏出三张“老绵羊”作谢礼。又是一番打架似的推让。最后我让张警尉拿这些钱打点那些饿鬼小警爪，他才勉强收下了。在那时，这个案子虽然实属敲诈，但没有一千块钱是不能结案的。姜家只花了四百元就将老爹平安地保了出来，实属不易。打发走了小姜兄弟俩，我就和张再逢商量给他母亲治病的事，征求了老太太的同意，我决定请司令部的上尉王军医来看看。

第二天上午，我就陪王军医来到了张家。张再逢中午赶回来，顾不得擦去满头的大汗，摘下大盖帽和警刀就直奔老娘床前，问长问短。王军医给老太太诊断完后，打了一针西药，又留下几包粉剂，答应第二天再来。就这样一连三天，打针吃药，老太太的病竟然好了起来。第四天就摸起大烟袋

抽起旱烟了。乐得张警尉热泪盈眶，感激得不知对王军医说什么好。

为此，他几次找我商议酬谢王军医的事。王军医早有思想准备，诚言婉拒了。他说：“老弟，生活在这个世道上，多交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个张警尉是警察里边难得的好人，交上这么个朋友我已经很高兴了。我是个医生，干这行的嘛，用药又没花我的钱。老张的心意我领了，酬谢的事可使不得，咱俩又是同事……”

事后，小姜来到我家，硬塞给了我老爹一张“老绵羊”，说是孝敬老人打酒喝。

1943年春天，江上军“海”改“陆”的过渡已基本完成，陆军势力已经完全压倒了海军。江防舰队的海军旧部处于受挤压、排斥的境地。前任司令官尹祚乾向“满洲国”皇帝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并给了他一笔不小的养老金。

司令部及全军的一些海军旧部及一些地方乡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席间有人大哭大嚎，大发牢骚，醉倒了好几个军官，其中包括我。几天后大家去车站给他送行，江上军军官来了很多，但没一个日本人。尹司令一家十几口人，箱笼包裹一大堆，算不上什么“衣锦还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解甲归田”比较准确。我只是有点担心他将来的“营养品”——黑药丸如何接续得上？

工作的不顺，人际关系的紧张使我情绪动荡，意气消沉，不由得萌生了“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念头。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反复权衡利弊，日夜思索各种方案，渐渐坚定了出走的决心。

我自以为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切实可行的计划，但其实质，不过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幼稚的幻想和盲目的冲动！

我的目标是北平。

半年前，我结识了一个名叫栾子玉的商人。他为人正派，爱交朋友，经常出入司令部推销文具、办公用品，以此为生计。由于我掌管发放“门鉴”（出入证），给他提供了一些方便，互有来往，渐渐成了知心好友。我曾多次向他吐露过要去华北另闯一番天地的想法。

栾子玉的祖籍就在河北省京、津一带。闯关东之后，生活也不尽如意，这里肯定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所以正打算回关里去。

不久，他专程来告诉我，要去北平与人合伙开一家饭店，一切都安排好了，即将起程。我把他拉到小酒馆里给他钱行。吃饭时，他给我留下了两三处可以找到他的地址。将来到北平，只要找到他便可以吃住无忧。

我另一个投奔的目标，则是哈尔滨市军用被服厂的女职员霍亚男。这人三十多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交往中相处极好，我称她霍大姐。她的丈夫是日本人，叫黑田龙二。战前是职业记者，来满洲后仍以记者身份出现，但实际上是关东军的谍报人员。

“七·七”事变以后，黑田龙二以商人的身份去北平开了一家日式餐馆“黑猫料理店”。据我推测，这餐馆同时也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霍大姐后来也去了北平，协助丈夫管理“黑猫料理店”。她去后，曾两次给我来信召我去北平工作，并保证说靠黑田

先生的门路，在北平警界谋一个高级警官的职位不成问题。

另外，我还有不少流亡关内的高小、国高的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北平读书。这些人的家都在哈尔滨，一切家书信件，来往汇款等等琐事都由我包办、跑腿。一旦去了北平，就算上述两项安排都落空，有这些同学、故旧的帮助，我也不至于走投无路而陷入绝境。

但我这次出走（也可以说是逃亡），最困难的两道关卡还是家中的阻力和闯出山海关的“特别通行证”。

如何安排年迈的父母和老婆孩子，使我费尽了口舌和心血。有哥哥嫂子的资助，家里的生活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老人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只能用“好男儿志在四方”去说服、宽慰他们。可我老婆这道关我几乎无法通过。我在江上军司令部的处境她根本不顾，也不理解，反而认准我去北平是为了追某个女戏子。天知道这坛子醋是什么时候酿的！我一再保证，只要在北平谋到了差事，安顿下来，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同去享福，让他们放心。但他们怎么能对我放心呢，父母担心的是华北政局不稳，北平治安混乱，这一路将充满凶险；老婆担心的则是“女戏子横刀夺爱”！

同时，为了插上飞越山海关的翅膀，我必须弄到“特别通行证”，否则，一切计划都无法实现。

司令部人事处原日本海军少校菅原，是我到江上军以后一直相处很好，受我尊敬的老前辈，五十多岁，待人和蔼可亲。他的独生子是个大近视眼，当兵不合格而得以求学，是我在政法大学的同学，但他是本科生，也是法律系。他们一家三口酷爱中国的大蒜，自从我有了这个计划后，每次去他家必拎一挂大蒜为礼，再就是醇厚浓香的名酒“史国公”。

在我几番地进攻，再三地纠缠之下，老头子终于松了口，让我发誓：“死也不说出证件的签发人！”我以男子汉的名义做了承诺，于是终于得到了一份“去北平探亲，限十日内归队”的军用通行证。

这种证件，其实是只限于在“满洲国”的军职人员因年老还乡，医病或是护送亲属遗骨的凭证，用于探亲是极特殊、例外的了。

在副官处，我向矢野处长提出要回营口老家去给祖上迁坟，立刻就得到了批准，给我开了假条。期限也是十天。就此，我逃离“满洲国”国界，奔向北平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正式向副官处处长矢野辞行。这个日本老人再三叮嘱我要按期归来，别超了假。回到家里，我拿起早已打好的行李；一个手提小皮箱，一个大柳条箱出了门。后面是苍老的父母和凄惶的妻儿，爹娘默然无言地目送着我，眼中是深深的担忧和无奈；妻子抱着孩子泪光莹莹，脱口而出的叮嘱是：“那个戏子要把你甩了就赶紧回来……”

火车站的候车室一贯杂乱无章，像个难民营。

日本铁路员工粗暴的管理方式和设备简陋的车厢，把乘客的旅行变成了猪仔、牲口的运输。车厢不分档次也不对号入座，旅客乱挤，行李包裹乱放，人声嘈杂，臭气熏天，根本谈不到什么舒适和卫生。这趟车是从华北开来又往回返的，能买到票，登上车已是求之不得，哪有人还奢望什么别的东西？高级车厢不是没有，但那是属于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才能享受的地方，像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只配和老百姓挤在一起踏上旅途。

将大柳条箱办了随车托运后，我挤上了列车，座位早就没有了。我寻得一个夹空儿坐在了地板上，把手提箱抱在怀里，闭上眼睛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颠簸，强迫自己踏入了北平寻梦的佳境……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程，第二天晨曦初露时，列车进入了“天下第一关”，“满洲国”和华北的边界咽喉——山海关。

列车将在这里停留一个来小时，对入关旅客进行检查、验票，并兑换货币。人们必须把自身携带的老羊票换成“华北流通券”。于是，所有旅客都被赶下了列车，只有少数有身份的日本人留在了车上。

月台上，黑领章的日本宪兵牵着大狼狗，十几个人列成一排，虎视眈眈地走来走去，如寻猎物。

旅客下车接受检查不得携带行李，一律留在车内让另一伙人任意翻检。几百上千的旅客，男女老幼，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听凭这些如狼似虎的宪兵在浑身上下进行搜查。年轻妇女的身上足这些宪兵最感兴趣的地方。受到这些野兽肆意侮辱的妇女一个个瑟瑟发抖，面无人色，但没一个敢露出一丝的不满和反抗……有几个身穿日式睡袍、和服的朝鲜男女被宪兵从妇女的胯下和怀抱婴儿的襁褓中搜出了鸦片和白粉（海洛因），立刻被一顿大耳光打倒在地，皮靴、警棍齐下，大狼狗也扑上去狂吠不止。这些“二鬼子”此刻都尝到了双倍亡国奴的滋味！

另外，还有三五个青年也被抓走，按“嫌疑犯”被押往了宪兵队，其罪名大概是八路军、共产党的探子或抗日分子，即便不是，也得被作为劳工送到什么地方去下苦力了，反正凶多吉少。我的“特别通行证”在这里产生效力，顺利

通过了检查。

回到列车上发现，整个车厢如同盗贼光临，地震刚过，一片狼藉。所有的箱笼、包裹全被打开，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打碎的酒瓶，踏扁的干粮，扯破的衣物几乎无一完好。在车下受尽恫吓的旅客此时还得自己动手收拾东西。车厢里又是一阵哭叫、吵骂的骚乱……

我的手提箱被倒扣在地，东西倒没丢，只是几根哈尔滨腊肠被“狗”叼走了，吃剩的一个面包被大皮靴踩扁了一半。我算是挺幸运的。身后的一个妇女在嚎啕大哭，她手上的银镯和一个金戒指在搜身时全“丢”了！

列车在山海关换了火车头，关外来的车头在这里加水后挂上出关的列车返回去了。换了铁路符号的火车头一声怒吼，拖着列车风驰电掣地闯过了天下第一关，开进了华北平原。

车厢里的旅客多有更替，昌、滦、乐、津、京的各种口音充溢四周，眼前除了老百姓普通的对襟长袍、短褂之外又出现了华北伪政权的官员、军、警等等新奇的服装和标志。

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是王揖唐，此人是日本留学生，北洋军阀出身。临时政府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条纹。军队官兵的服装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什么区别，也是黄绿色，帽徽也是五色五角星。车厢里，站台上有时也能看到一些“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和士兵。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取代蒋介石政府的是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其军队服装与蒋军一样为灰色，“国旗”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不过在旗杆顶上加了一条黑色飘带，上面有“反共、和平、建国”六个白字，像个不祥的灵幡，叫人一见就丧气，真不知是何方高人的设计。

经过入关时的一番折腾，我的西服领带、白衬衫已狼狈不堪，七扭八歪，杂在老百姓堆里显得不伦不类，极不和谐。偷偷摘下领带，敞开衣襟后才觉得有些自在起来。

黄昏时分，列车进入天津。

停车后，走上来四五个身穿黄绿色军装的人开始检查证件，跟着又上来几个着黑色警服的男女挨个查票。华北的警察一身黑，老百姓称之为“黑狗子”。警章镶在衣领上，和旧军阀时代的警察一样。

检查证件的军人是“华北靖绥军”大汉奸齐燮元的队伍。偶尔也会看见几个一身灰色，头顶圆形软帽，中间别着国民党党徽的四不像军人，一问，原来是汪精卫的“反共和平救国军”！看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相比之下，让人觉得“满洲国”是一潭腐臭的死水，而乱糟糟的华北则是一个沸腾的“火锅”，是一锅煮着山鸡、野兔、屎壳螂的大杂烩！好端端的一个中国，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唉。

大约晚上八点，火车终于开进了终点站，北平。

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算来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我拎起手提箱大步向出站口走去。凭着盖有大红印章的通行证，我顺利地走出了最后一道关口。而其他旅客则又被逼着在站台上排成一列。将随身携带的行李全部打开，接受再一次检查，确切点说是掠夺！那些“黑狗子”对下车的男女同胞进行了极认真、彻底的搜查。人们身上的手表、戒指、项链、耳环、小古玩、珠宝、饰物等等混过山海关而幸存下来的东西这回都在劫难逃了。银元、现钞则被抽取一部分去“检验真伪”，身上一无所有的，便可以得到特殊的补偿：几个耳光，一顿皮靴踢踹。满站台上都是身穿警服的强盗在追骂、殴打、抢劫着旅客。个别稍有身份、来历的人则

与“强盗”们在互相辱骂、推搡……让人触目惊心！真是“国之将亡，妖孽遍地”。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半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北平，怎么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啊！

走出栅栏口，站在火车站前的马路上，街上已是一片灯火闪亮的夜景，前门箭楼巍峨的剪影是这古老都市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印象。

满口京腔的洋车夫一拥而上兜揽生意，我浑身疲倦得快散架子了，立刻跨上了一辆洋车。年轻力壮的车夫立刻小步跑了起来。边跑边问去处。我顺口说出“王府井，凤鸣园饭庄”，洋车夫哎了一声，脚步立刻加快了。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入关。到了北平，东西南北全分不清，王府井在哪儿，“凤鸣园饭庄”在何处都不知道。这洋车夫若是把我拉到黑胡同里抢了、宰了毫不费力，但这洋车跑得又快又稳，十几分钟后已经停在了一条繁华大街的拐角处，栾子玉留给我的地址正在眼前：凤鸣园饭庄，黑匾金字，气派非凡的一个大饭店！

我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在山海关兑换的“华北地区流通券”递到了车夫面前。他谨慎地只在零钱中抽出一张面值一千元的小票，点头称谢而去。这一千元其实只相当于东北老羊票的一元钱而已，看来这洋车夫挺憨厚，不欺生。我强打起精神拎起小皮箱，大踏步走进了饭店。

这是一栋“口”字形的二层建筑，宽敞的前厅两侧都是高档柜台和摆设，穿着雪白的对襟大褂的伙计来往穿梭，“里面请，楼上”的招呼声此起彼伏，饭菜香味扑鼻，生意十分兴隆。一个五十多岁胖墩墩的掌柜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交谈中知道此人姓聂。他一听我是刚下火车，来找栾子玉

的，立刻惊讶地大叫起来：“唉呀，原来是左先生！从东北来？栾老板早就提过您。没想到您还真来啦！快请到楼上……栾老板今天东城有饭局，恐怕一时回不来……”他一边招呼小伙计，一边接过我的手提箱伸手引让着，与我一同上了二楼。

这个“凤鸣园”在北平是与“东来顺”齐名的大饭店。楼下散座，楼上是一排排雅间、客房。红男绿女宾客不断。到处是欢声笑语，间杂着胡琴、清唱的弦乐之声。

我被让进了一间挺清静的客房。两床两桌双椅，十分整洁。聂掌柜的说，这是经理们临时议事、住宿的地方。

初来乍到，本应客套一番，但我疲惫已极，实在懒得多说话。聂掌柜的似乎十分理解，叫小伙计打来洗脸水又加一大壶清水放在一边，说马上去给栾老板打电话，就先出去了。

我开始盥洗时发现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饭店的喧闹声已趋微弱。正在洗脚时，聂掌柜进来了，说：“左先生，电话已经打通。栾老板关照不要你接电话，让您好好休息，明早他一定来会您。您就歇着吧，跟到自己家一样……”说着退了出去。

蝉声阵阵催我入眠。这一觉睡得好香，连个梦都没做。